

目 录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合作编撰洽谈会纪要·····	2
中波当代艺术与美学学术研讨会纪要 ······	4
在中波当代艺术与美学双边座谈会上的致辞 ······	7
■葛兆光	
傅斯年、陈寅恪与德国兰克学派之关系 ······	9
■施耐德(Axel Schneider)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	
如何书写中欧艺术史 ······	12
■Piotr Piotrowski 波兰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教授	
里斯本访学记 ······	15
■董少新	
宫纪子著：《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图》 ······	18
最新书讯·····	20
外刊撷英·····	22
博士后论坛：从翻译家到汉学教授——傅兰雅身份转变探析·····	25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08.01—2008.03) ······	26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合作编撰洽谈会纪要



2008年3月4日上午，我院召开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编纂《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的洽谈会议，会议由葛兆光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越南汉喃研究院院长郑克孟、研究人员丁克顺、黎氏秋春、我院常务副院长汪涌豪教授、双聘研究员陈正宏教授、学术委员会委员周振鹤教授、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王立翔副总编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韩结根编审。会谈在友好愉快的氛围中进行，双方就丛书的编纂出版合作事宜进行了讨论协商，与会专家教授提出了富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建议并达成如下初步共识：

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编撰《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以丛书的形式出版这些现存的汉文燕行文献。出版时编者署名为“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设立丛书编辑委员会，由双方各4到6名专家，加上出版社方面的人员组成，双方各有一人负责。丛书的形式以影印原书为主，再依各书具体情况，附以详略不等的解题。排序以年代先后为准。

二、汉喃研究院负责提供越南所藏所有整书和整卷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资料。为保持原貌，资料复





制将以扫描原书为主,最大程度地做到页面清晰。汉喃研究院将提供丛书目录以及相关资料,如完整的书名、卷数、准确的册数、大致的页数,作者或编撰者的朝代、姓名和生活年代以及准确无误的收藏单位名称等,以便写作各书之解题。

三、解题写作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负责。

3月8日上午,双方在协商基础上就合作编纂《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签订最终协议书。同时,约定复旦大学出版社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机构,复旦大学文史

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越南汉喃研究院院长郑克孟研究员、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作为三方代表签订了出版协议书。这次合作是我院一直致力于推动“从周边看中国”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这套文献的编纂出版,必将有利于促进对于古代中国的认识,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与新的观察视角,也会进一步加强中越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

张胜利



中波当代艺术与美学学术研讨会纪要



教授、中文系朱立元教授、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李超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魏劭农教授、上海书画出版社卢辅圣社长、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王天德教授，我院博士后人员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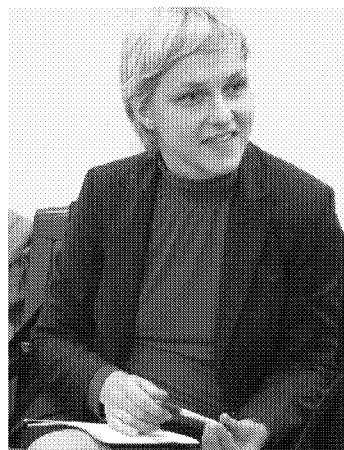
葛兆光教授和 Piotr Piotrowski 教授为研讨会作简短致辞后，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艺术史系 Piotr Bernatowicz 和 Monika Szmyt 分别作了《团结与审查》(Solidarity and Censorship)、《中国当代艺术在波兰》(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in Poland) 的主题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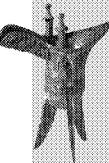
在发言中，Piotr Bernatowicz 从当代艺术审查的独特视角探讨了当代艺术的表现形式，特别是上世纪后半叶波兰政治言论和艺术传统之间的密切关联。他首先提出：政府公共部门应当如何允许艺术界发出一些

2008 年 3 月 19 日下午，中波当代艺术与美学学术研讨会在我院举行。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波兰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艺术史系主任 Piotr Piotrowski 教授一行 6 人、我院院长葛兆光教授、常务副院长汪涌豪

不同的但并非特意为之的声音？讨论这些艺术作品应该是在法庭上还是在公共舆论中？他认为，只有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人，才会真正理解这些往往跨越了法律界限的艺术作品。因为仅用法律条文处理会直接导致文化上的无知与艺术表达自由之间的冲突，并不能解决艺术家公德心与艺术表达自由之间的矛盾。

Monika Szmyt 则考察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在波兰的展出情况，并从词源学的角度追溯了“展出”一词的涵义，她认为波兰观众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观赏一开始受到参展者的引导，受到他们对作品的选择，艺术背景和创作、展览经验的影响。从纯粹的“舶来品”到对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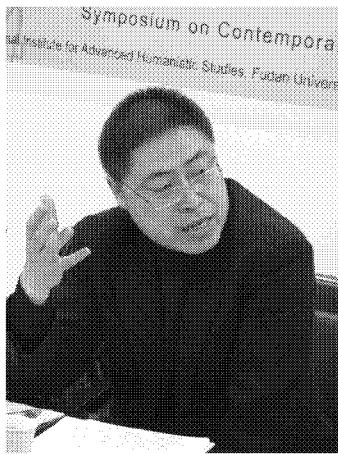


国艺术某种“迷醉”式的欣赏,再到波兰对中国当代艺术兴趣不断增长,在跨文化的基础上以及“亚欧交流”的背景下进行“通力协作”。她认为,中波双方合作对话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与日俱增,一种容纳不同艺术和文化的开放的环境正在逐渐形成。



李超教授代表中方作了《中国当代架上绘画发展新动向》的主题发言。在考察中国当代油画的文化环境的基础上,李超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油画在走向多元化,随着国际美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当代架

上绘画面临着不断被边缘化的挑战。中国架上绘画的主流往往在写实主义风格背景中寻找自己艺术探索的空间,而新生代的画家则试图通过感性的玩世、波普和理性的新具象等艺术话语方式,将架上绘画引入了与传统学院派思想相迥异的境地。他还提出,中国现代艺术进入更为理性的思考和反省时期,中国当代架上绘画则呈现出抽象风格、新具象风格以及实验风格的发展新动向。在西方架上绘画逐渐式微的趋势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油画大国”,而种种新动向表明,中国架上绘画发展潜力巨大,理应有对架上绘画的发言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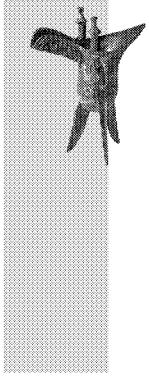
主题发言后,魏劭农教授围绕中国艺术的发展情况以及历史地位、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内在关联、中国艺术与中欧艺术之间的对比作出回应。他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展现方式很特殊,表面上它与

中国传统艺术几乎是断裂的,但其实当代艺术的发生和表现形式与传统艺术之间存在逻辑的必然关联,不了解中国传统艺术就很难深刻理解中国的当代艺术。现代的“艺术”概念在中国的出现虽然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但中国还是有其伟大的艺术传统,“艺术”在引入中国之后,承担了很多和艺术本身没有关系的责任。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的开创者徐悲鸿所引进的西方艺术的传统是一个已经衰弱的古典主义版本,这个传统至今仍影响中国的艺术教育,而西方当代艺术的传统却始终在中国未占主流。他还提到,中国当代艺术后来的发展主要受到苏联影响,其源泉还是法国的古典主义传统。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曾出现过短暂的视觉艺术革命,但当代艺术很快被商业化了。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断裂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走向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当代艺术远比现在所表现的要复杂得多,有一种情况可能阻碍了我们全面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了解,那就是西方的观察者过多的依赖了中国的策展人艺术展出的方式,而这些策展人本身可能已经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魏劭农教授主张艺术应该重新走向生活,直接面向观众。此外,魏教授还对中欧艺术史的写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天德教授提出了传统艺术的现代复兴问题,对于在文化与经济同步变革的时代,全球都在关注中国古典艺术所衍生的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成为热门,如何让中国当代艺术继承和发扬古典艺术中的大雅方面,让古典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光辉,成为我们面临的任务和挑战。



卢辅圣社长认为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展览是经过特定选择过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他回顾了中国1985年后当代艺术的发展情况,新一代艺术家由于特定的政治和现实因素对传统艺术有先天的反叛性,90



年代中期后中国当代艺术出现两个奇迹：合法化和商品化。相较于传统艺术，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越来越受到了西方艺术的眼光、观念和方法的影响。

会谈氛围热烈而友好，与会专家学者

对当代艺术和美学面对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当晚，Piotr Piotrowski 教授还应邀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如何书写中欧艺术史》的学术讲座。

我院正在积极推动“宗教、思想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这一课题，波兰是欧洲的艺术大国，波兰学者的访问有利于促进和加强中波之间在艺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当代艺术和美学有着积极的意义。□

肖军

在中波当代艺术与美学双边座谈会上的致辞

葛兆光

尊敬的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艺术史系Piotrowski教授，各位朋友：

非常高兴，今天有来自波兰的朋友，和我们一起讨论有关“当代艺术”和“美学”的话题，对于这个话题，我只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在这个场合，我想说一下我对当代艺术和美学的一些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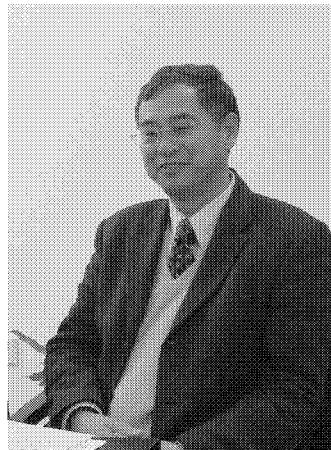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常常对当代艺术有一些奇怪的印象，就是它一方面似乎和传统艺术越来越远，它常常通过对于传统审美观的反叛和超越，来表达当代人对世界的新感觉和新经验，一方面它似乎又在不断寻找传统艺术中的一些元素，通过这些今天已经陌生化了的元素，表现它对当代世界的新经验的不满。因此，当代艺术有时候是反传统的，有时候是回归传统的，有时候表现着现代对传统的超越，有时候又表现着后现代对现代的超越。

今天，中国和波兰的学者在一起讨论，也许会涉及这样一些话题：在当代艺术中，什么才是更多人共同认可的好艺术品？中国和波兰，东方与西方的艺术理解有共同点吗？在还没有进入“后现代”的中国和波兰，后现代或后殖民艺术理论会对我们有什么冲击？对于过于“现代”或“后现代”的当代艺术，与仍然传统或刚刚离开传统的经验之间，如何进行协调？

现在，当代艺术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供展览作品用的画廊、各种以旧建筑改造的艺术建筑、街头的行为艺术表演以及艺术品市场，使得中国艺术在某些方面越来越接近西方现代艺术世界，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中国艺术越来越“看不懂”了，这个“看不懂”，也许就包含着理论和实践之间、创造的艺术家和消费的观众之间、市场价值和审美经验之间，有了距离，那么，今天的艺术学家和美学家们，如何来消除这个距离，让普通人能够理解这个已经变化了的艺术世界？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正在积极推动“宗教、思想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这一课题，今晚，Piotrowski教授将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如何书写中欧艺术史》的讲座，我们希望波兰学者的访问，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谢谢各位。□



復旦文史講堂

施耐德(Axel Schneider)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

傅斯年、陈寅恪与德国兰克学派之关系

Piotr Piotrowski

波兰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教授

如何书写中欧艺术史

复旦文史讲堂以学科交融的视角,探寻传统文史研究的前沿发展,尤其注重展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眼中的中国视境。自2007年3月以来,已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了二十五场学术讲演,成为复旦学子接触学术前沿的窗口。本期刊出最新两场讲演摘要,以飨读者。



傅斯年、陈寅恪与 德国兰克学派之关系

施耐德(Axel Schneider)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



近年来,民族主义以及集体认同和集体记忆的构成与发展等问题,引起了相当的研究兴趣。这一重新关注不仅与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再兴有关,也与全球化现象以及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相关。

基于对两位被称作“中国的兰克”的杰出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和傅斯年(1896~1950)的史学的理解,我认为,首先,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家所面临的有关现代性的主要问题可以用德国的历史主义做背景来更好地理解。其次,一些被称为保守派的思想家确曾显示出对现代性问题的较强的自觉意识,这些意识往往隐含在有关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争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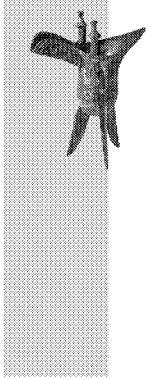
“现代性”是指正在进行的历史化过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那些曾被认为永恒和普遍的规范与价值的相对化。在欧洲,这一过程的标志是关于世界结构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假设的衰落,以及伴随而来的传统的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一致性断言的衰落。世界越来越被认为不是一个有限的世界,而是变成一个元世界(meta-world),消解在多种可能的世界观的多样性中。

康德的认识论将世界结构转变为先验的意识的结构,为尚在进行之中的世界去中心化过程奠定了基础。然而,历史被理解为人类实在的历史性与相对性的观点尚未发挥作用。但至迟到黑格尔,历史便成为中心

议题,西方思想界自此以后始终在努力调和历史的相对性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黑格尔的历史观基于对历史个别性必须调和的普遍精神的确信,最终使得个别性服从普遍原则。

此后从赫尔德的个体文化哲学到兰克的历史主义以及狄尔泰基于生命哲学的历史观,不断对相对主义发起挑战,他们努力维护个别性,同时不放弃将历史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追求。但一战以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偶然事件与规范原则之间的裂痕无法调和。例如海德格尔对所有证明形而上的绝对性的企图的驳斥,声称人类剩下的唯一带有普遍性的就是她的历史性。

这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没有重新建立一个普遍的历史目的论。作为启蒙主义的支柱的普遍理性,丧失了在历史中的主导作用,其本身也被历史化了。大部分历史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都否认启蒙主义关于进步的观念,并用“发展”的观点取而代之。我认为仅仅用理性进步这样一个概括性的观念或者任何其它绝对性观念作为现代性的特征都是不充分的。现代性应当被理解为各种内在的冲突和紧张,一方面是一定程度上哲学的、神学的、历史的、或者科学的确定性的复兴。另一方面,由于尼采的贡献,上帝死了,人类被逼迫过



上了一种丧失了坚实的形而上学或神学基础的生活。

中国现代思想史长期充斥着五四史观或者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站在对立面的中国学者则往往被诋毁为保守甚至反动的。而在欧洲，正是保守派对澄清历史性的观念以及现代性的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保守派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历史性、民族个别性和普遍性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历史上，史学撰述在中国享有比在西方社会更高的地位，因此在各种现代的争论中，史学往往处在中心地位，不仅引发了对中国认同的重新定位，同时也使对现代性带来的挑战的意识日益增强。早在晚清时期，西方观念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用以应对这种挑战的概念甚至语言。1910年代以后，各种引进的史学概念与传统的史学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非常活跃并且多元化的史学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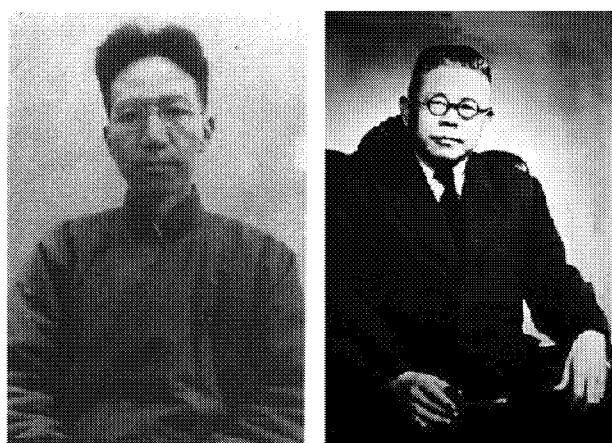
傅斯年和陈寅恪都被认为受到了兰克的影响。兰克通常被看作经验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他强调档案史料的作用，以期获得关于历史的客观知识。历史主义的兰克反对启蒙主义对待历史的方法，严厉抨击其抽象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个性的抹杀。他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取向”和“自身的理想”。因而书写历史的目的就是阐明各个时代之间的差别，揭示各个时代都是上帝意志的展现，不管其互相之间有多么不同且不存在可比性。这一方法论的结论表明了历史研究基本上是一项解释学的工作。历史学家应该通过

直觉和冥思去感受各个时代的独特性及其理想，不让过去屈从于现在的、主观的、创造意义需要。意义只能在历史中发现，而意义与现在相关联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上帝。这一对历史个别性和宗教普世性之间关系的理解，正是兰克的方式，他用之以维护德意志思想所代表的个别性，反对他所理解的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普遍启蒙的傲慢，同时又不陷入相对主义。

那么，为什么对历史研究采用了不一样的哲学和方法的陈寅恪和傅斯年会被称为“中国的兰克”？对两者的史学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弄清楚西方思想被引进和吸收及其与传统方法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以揭示中国史学家如何处理有关历史性的现代问题、如何对待认同危机，以及如何完成重新估价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任务。

傅斯年具有非常明显的实证主义科学取向。他认为历史是由地理——气候这样的事实所决定，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类似，并用此观点来解释中华民族的形成。同时，傅斯年认为历史是人类朝着理性、科学思想的普遍进步过程。他称经验主义的训诂和考证为科学与理性思想的先驱，由此摆脱了西方色彩而提升到了普遍地位。他强烈反对对历史的任何阐释，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对史料的考证与整理，让包含在史料里的事实本身说话。他反对运用任何历史理论和观点，并激烈谴责史家涉足政治。但当他试图通过将中国纳入具有普遍特征而事实上来自西方的世界历史之中来建立中国认同时，实际上便放弃了寻求什么是中国特有这一问题之答案的可能性。

与傅斯年相比陈寅恪更强调文化的个别性。他假定所有文化是平等的，因此而隐含了普遍主义的视角。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一种特有的“民族精神”的渐进发展，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其核心，但同时强调这是抽象理想而非具体的永恒不变之教义。他认为在中外交流中，民族精神通过对外来影响进行吸收消化而始终在发展。任何关于永恒不变的民族性的观点都违背了变化中的延续这一观念。使陈免于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是其“抽象理想之同性”的观点。即认为人类的普遍性是“抽象理想”，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必须受到保护以维护各个文化的认同。



陈寅恪与傅斯年



因此,史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史料的仔细梳理,以达到对民族精神在各历史时期之具体表现的“同情之了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史家才可以以今天的视角对历史进行评价,历史不再是某种绝对原则的表现。陈因此而消解了传统的知与行的统一,赋予了史家仅仅作为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守护者的作用。

陈寅恪的观点无疑更接近兰克的解释学的理论,但其与兰克之间也有本质的差别。兰克生活在基督教时代,神学尚未因20世纪破坏性的打击而陷入困境,而陈寅恪经历着比兰克更深远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动,儒学急剧衰落,并因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加速。这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远非法国与德国文化之间的差别所能比拟。因此陈寅恪试图建立起一种史观,可以包容变化,但不至于对延续性和认同感产生威胁。他采用注重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实现了

这一目标。如兰克一样,陈寅恪认为历史的意义是历史本身所固有的,但同时他又指出意义可以因不同人的解读而不同。没有形而上学的背景,并反对进步论的普遍目的,陈寅恪的史观为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同一文化内部的多元性保留了更多的空间。

陈的例子清楚地表明,民国时期的一些中国历史学家与其欧洲同行一样,试图抓住现代性特有的历史性与相对性问题。他们对于历史、文化和国家的观念要比我们原先以为的更多元化而少霸权色彩。但是由于这些学者有意识地回避政治,从而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同时与官方史学的隔离使得他们丧失了重要的信息来源,并且被排除在进步史观之外,从而使他们的观点长期以来都被忽视了。□

朱莉丽 摘

如何书写中欧艺术史



Piotr Piotrowski

波兰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教授



战后西欧与东欧艺术的不同当然在于它们的意识形态背景。西欧所谓自由的、民主的意识形态似乎为多元的、异类的艺术及由之而来的艺术史创造了良机，而基于统一的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东欧艺术观则让人想到更加相似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史。但是，我想说的是，至少就艺术史来说，这并非实情。原因在于古典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所定义的，并未像西方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在地方文化政策中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尽管东欧各国意识形态几近相同，而意识形态国家政策却各有差异，它们呈现在不同的国家文化政治中，在相同的历史时刻在不同的地区产生出同类艺术的不同内涵。东欧战后艺术史显然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别因素，而非各国一律。

虽然二战后的东欧整个区域在政治上或多或少是一元化的，但每当谈及文化，还是要各国区别对待。因此，区分每个国家的艺术史叙事就成了我们学术实践的核心问题。下一步就是处理这一地区的国家叙事并创建一种艺术史的元叙事，不过，这并非为了弄出一个与西欧艺术相对立的中东欧艺术的单一叙事，相反，这是为了建构多个、不同种类的观点。在这些国家里，政治为国家文化作品提供了不同的环境，其结果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艺术的内涵也各不相同。当创建艺术史的元叙事时，我们还要解决不同的地域含义，从更广层面

上指出其相似和差异，我们将之称作地域性因素。我著重做比较研究，即，着力于比较或解决在一些历史焦点时刻当地艺术呈现出的不同含义。因此，这样的元叙事将是一种比较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保持其多样性和非层级性的特点。

这里，我将比较三个例子，它们实际上是三个“独立的美术馆”，一个是前民主德国的克拉拉·莫施（Clara Mosch）美术馆，第二个是波兰的佛克萨（Foksal）美术馆，第三个是匈牙利的巴拉顿博格拉尔（Balatonboglár）美术馆。我将从它们是如何在三种文化意识形态国家政策之下运转的做比较，也就是说，它们是如何在脱胎于相似意识形态——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这些国家转变成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三种不同的文化政策下经营的。

卡尔·马克思城（现在的肯梅尼兹）的克拉拉·莫施美术馆开业时间相当晚，在1977年，并于1982年关门。由于政治紧张加剧和当地知识分子反对政府压制性政策情绪的高涨，1977年在民主德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时间，克拉拉·莫施美术馆的艺术家们是在与西方艺术家们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从事这些活动的。在西方，没有政府控制，或者说，西方的艺术界是在相对东欧来说较为松散的监督之下活动的。所谓



艺术价值的通用标准是在西方发展出来的,用于东欧的历史实践中时,就与东欧的情况和作品不甚相符。无论如何,在当下的背景中,远为重要的是记载了与美术馆有关的艺术家们的文化场景。明确地说,就是当局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忍受一段时间的、可以让艺术家们享受某些自主的“小环境”。民主德国的独立艺术环境是与美术馆相关的艺术家们的作品能够产生的关键因素。那里产生的艺术没有墨守陈规,因为涉及许多非常复杂的东西(哲学、神秘学、卡巴拉、道、炼金术、自然科学及深奥的知识等),这些艺术到了极端抽象的水平,审查根本触碰不到,尽管审查员不喜欢这种独立的艺术与文化,这是没有宣传和政府控制的另类文化存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然而,东德的艺术家们也不得不为保住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奋斗,他们不是通过授予或认可,而是利用各种压力、请求甚至与比较开明的官员联盟等,从当局那里获取到了这些东西。

上世纪七十年代波兰的情形与民主德国的大相径庭。在那里,当局仍旧认可经验艺术的特权,并放弃了对艺术作品进行控制的想法。大体上,在波兰,人们可以做任何事情,随心所欲进行任何艺术创作,成立任何独立的机构。很大一部分所谓独立的美术馆都有政府资助,即,政府不是仅仅容忍,而是扶持。换句话说就是,波兰艺术家们几乎是毫无顾忌的,我说“几乎”是因为他们不允许进行任何政治批评。这是艺术家与政府之间默许协议的关键条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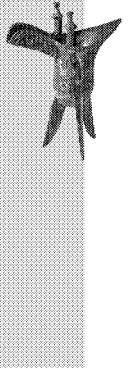
如今仍旧在运作的华沙佛克萨美术馆作为反抗那个年代官方艺术的标志于1966年成立。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佛克萨美术馆开始参与同类美术馆或团体就同类项目的市场竞争,这在美术馆的主管维斯瓦夫·博罗夫斯基著名的文章《伪前卫主义》(1975)中已经被描述过。博罗夫斯基反对所谓“伪前卫”的因循守旧,也反对采用“新前卫”数量庞大而完全缺乏重要艺术价值的艺术品,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正确。佛克萨美术馆的问题是,在博罗夫斯基写他的文章时,他没有宣告任何政治承诺。佛克萨美术馆及其艺术家们对他们象牙塔外正在发生的事情仍旧漠不关心。甚至任何人都可能会更加苛求:这样一个重要的美术馆,有这么多理论意识,在东欧有着独一无二的地

位,它理所当然应该对日渐高涨的异议做出支持的姿态。但佛克萨只是在与伪前卫主义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论。

第三个是匈牙利的巴拉顿博格拉尔美术馆。1968年。捷尔吉·高兰陶伊租下了巴拉顿博格拉尔的天主教礼拜堂,起初他建立了个人工作室,这里逐渐成为一个非常有活力、生机勃勃的艺术中心。但后来当高兰陶伊想要使这间美术馆“合法化”即转变成公共展厅时,遭到拒绝,美术馆最终于1973年关门停业。在匈牙利,形势与上面提到的波兰和民主德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有名的三T(容忍、禁止、支持)文化政策下产生了极度的不确定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以来,与波兰人相反的是,他们没有与政府有过任何合作。当然,政府有时也会允许艺术家展览他们的作品,比如著名的IPARTEV在1968年和1969年举办过展览。1956年布达佩斯事件后,匈牙利政府不再如民主德国那样大加限制艺术和文化活动,而是像波兰一样,明确地欢迎现代艺术,匈牙利容忍新前卫运动,但与此同时在“官方”形式上禁止它,只是没有明确地压制。

如此,我们了解了三家美术馆,这是三家在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中运作的机构,尽管这三者有着相似的意识形态来源,即被称作真正社会主义的、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古典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具体的环境却不同,在这三个国家中,民主德国是一种制造独立文化的“小环境”,它所制造的艺术相当具有自由性,或者至少不是墨守成规的;在波兰根本没有这样的“小环境”,政府支持相当前卫的艺术,为了不失去特权地位,这种艺术并不真正自由或者说还相当陈旧;在匈牙利,艺术家们对制度公开批评,他们可能是最自由的,只有通过批判压迫性环境,艺术家们才能得到所需要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如果我们分析更多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就会得到东欧艺术史的多样真实画卷,明白它与西欧的艺术史根本不同。这就是为什么通常对东欧艺术史的描述总是或多或少受国家这个框架的限制并注定比西欧的艺术史更加具有多样性的原因,对西欧艺术史来说,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发挥的影响似乎更小。

当撰写东欧战后艺术史时,我们无法创造一个适



合整个东欧艺术作品的历史框架，即使这些艺术作品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被同时创作出来的，但由于许多政治原因这些国家的情况互不相同。它们所一致的只是同在苏联的笼罩之下，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东欧被正式认可。不过，在特定的历史分析中，这样的意识形态框架并不很有用。更有成效的是既了解国家意识形态也了解特定国家的文化政策，这种方法可

以说明那个时期的东欧艺术具有多样性、多中心性和富有活力。简单来说，充当东欧艺术作品历史背景的政治实践，即国家政策，而非意识形态，能够从多个方面说明这个地区的艺术。□

王红霞 译
杨琴 摘

里斯本访学记

董少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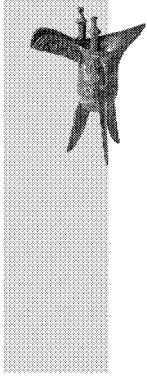
2007年12月10—24日，我随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黄一农教授一同前往葡萄牙里斯本作短期访学。上世纪方豪先生曾游历西班牙、葡萄牙，后撰成《流落于西葡的中国文献》(见《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介绍了葡、西两国各图书馆收藏的中文书籍。而我们此行的目的在于，考察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文献和火炮遗存，并与葡萄牙相关学术机构和学者建立联系。我曾于2001—2003年间求学于里斯本，2006年2月亦曾在那里访学一个月，所以这次算是故地重游了。以中国的眼光看，葡萄牙似乎是个“静止”的国家，七年前去过的咖啡店、小饭馆，现在仍无一例外地开在那里，以前常去的街道、图书馆、档案馆，这次再去，似乎没有任何变化。或许正因为如此吧，葡萄牙目前保存的大航海时代的文献与文物相当丰富而完备。

从台湾去里斯本非常不方便，途径曼谷、罗马，整个行程竟然花了一天一夜。到达时已是当地时间11日的傍晚。次日上午参观了里斯本圣乔治城堡(Castelo de S. Jorge)，它是里斯本最古老的建筑，在12世纪末和14世纪葡萄牙人抵御摩尔人和卡斯蒂里亚人的进攻中发挥重要作用。城堡四周陈列了一些火炮，其中有一门乃是从印度果阿(Goa)运来的。下午参观了

几处大航海时代的重要地点，如商业广场(Palácio de Comércio)，这是大航海时代回到葡国的船只上岸交易的地方；贝林塔(Torre de Belém)，是16世纪初为纪念达伽玛发现印度新航路而建的，并成为特茹河口重要防御堡垒，而今已是里斯本的地标。

傍晚前往里斯本澳门科技文化中心(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博物馆，参加了“国际港口——澳门第一个百年历史展”，其中有一部提及澳门的马来语手稿文献，以及瓷器、龙涎香等文物。澳门科技文化中心隶属于葡萄牙科技与高等教育部，是葡萄牙研究澳门史和中葡关系史的重要学术机构，拥有博物馆和图书馆，其图书馆是在澳门葡萄牙历史学家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个人藏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晚明以来的中西关系史文献、著作收藏甚丰。

13日上午前往新里斯本大学，与海外历史研究中心(Centro de História Além Mar)主任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见面，了解葡国学界火炮史研究，及关于东西方交流史的葡文文献情况，并参观了该中心藏书。该中心侧重于葡萄牙海外扩张史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均在这个领域选题，其中有几位学生的论文选题关于天主教传华史、澳门史、16—18世纪东方贸易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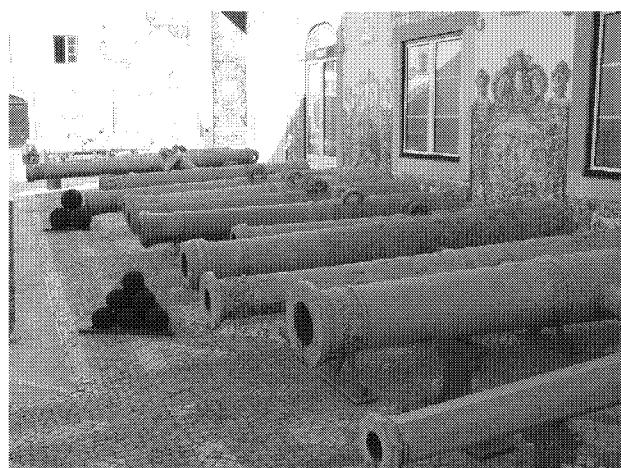


下午前往东方基金会(Fundação Oriente),浏览该基金会所出版的学术著作。东方基金会长期资助中葡关系史领域学者的研究,本人也是在该基金会的资助下方得以赴葡国学习语言和收集资料。同时它也是重要的出版机构,已出版大量历史、艺术等方面的著作。

14日上午前往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Biblioteca da Ajuda),看《耶稣会士在亚洲》(Jesuitas na Asia)系列手稿文献,发现了一批关于明末清初天主教史、社会史、火炮史方面的重要文献,例如明末由澳门入北京援助抗击满人入侵的葡国将领公沙的西劳的葡文手稿文献,对研究明清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共计收集手稿文献四千余页。目前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正筹划将《耶稣会士在亚洲》系列文献全部购入,总计六万余页手稿。

下午到葡萄牙海事博物馆(Museu da Marinha)参观,其中有几十门航海大发现时期的船上的火炮,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各类船只、武器等。

15日赴葡萄牙军事博物馆(Museu de Militar)调研。该博物馆藏有14世纪以来的各种火炮,是目前所见收藏航海大发现时代西洋火炮最多、最全的单位。除了了解其中葡萄牙本土铸造的火炮外,我们重点考察了葡萄牙人在果阿和澳门所铸造的火炮。这里收藏数十门16—17世纪葡属果阿造的火炮,对我们而言是



里斯本军事博物馆庭院中摆放的铜炮(黄一农摄)

新发现,可以了解西洋火炮在南亚的发展状况,及其对欧洲乃至东亚的影响。该博物馆藏有一门1640年在澳门铸造的火炮,为博卡罗铸炮场所造。博物馆的院落中也摆放着数十门铜炮,包括早期波斯人的火炮,航海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火炮等。作为来自中国的历史学者,站在这一排排巨炮面前,感叹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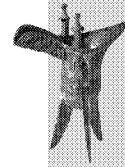
16日与葡萄牙学者萨安东(Antonio de Saldanha)和金国平两位教授一同再次参观了里斯本军事博物馆。他们向我们展示并介绍了萨安东先祖参与铸造的一些火炮,以及澳门博卡罗铸炮厂铸造的两门小型火炮。这些对西洋火炮在亚洲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下午前往亚欧大陆最西端罗卡角(Cabo de Roca)参观,也游览了葡萄牙在Sintra的佩纳王宫(Palácio de Pena),该王宫目前成为一座博物馆,其中有许多中国外销瓷器、家具等。

17日上午前往里斯本澳门科技文化中心,与热带科学研究所(Istituto Investigaçao Científica Tropical)Victor Rodrigues教授见面,Rodrigues教授是研究葡萄牙海外军事史的专家,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批相关文章,双方又就西洋火炮在亚洲历史相关问题交换了看法。然后我们又一同与澳门科技文化中心主任Luis Filipe Barreto先生等人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并谈了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穿梭于澳门科技文化中心图书馆、阿儒达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里斯本大学图书馆、天主教大学图书馆以及Bairro Alto区的数家旧书店中,收集、购买文献资料。除了前面提及的学者外,此行我们还认识了高埃丽(Elizebetta Cotta),Pedro Lage Reis Correia,Lucio Sousa和Isabel A. Murta Pina四位博士,他们都是研究东西方交往史的年轻学者。

20世纪以来,葡国学界整理出版了大量航海时代的原始文献,以下略举数种本次收集的关于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成套文献。

SILVA REGO, António da (ed.), *Documentação Ultramarina Portuguesa*(葡萄牙海外文献集), 5 Vols.,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1960-1967.

JOCOBS, Hubert (ed. & annotated), *Documenta Malucensia*(摩鹿加文献集), 3Vols. ,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74-1984.

SILVA REGO, António da (coligida e anotada), *Documentação para a História das Missões do Padroado Português do Oriente: Índia*(葡萄牙东方保教权史料集:印度卷), 12Vols. ,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49-1958.

SÁ, Artur Basílio de (coligida e anotada),

Documentação para a História das Missões do Padroado Português do Oriente: Insulíndia(葡萄牙东方保教权史料集:东南亚卷), 6Vols. , Lisboa, 1954-1988.

FARINHA, António Lourenço, *A Expansão da Fé no Extremo Oriente,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Colonial*(信仰在远东传播的史料),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46. □

(董少新为本院助理研究员)

宫纪子著:《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图》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为明建文帝四年(1402)朝鲜人画于丝织物上的地图,长150厘米、宽163厘米,原藏日本京都西本愿寺,后归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1910年,京都大学教授小川琢治摹写和解说过它,一百年前摹写的地图,至今保存在京都大学。由于葡萄牙人迪亚士(BARTOLOMEU DIAS)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达伽马(GAMA VASCO, DA)更晚在1497年才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所以一般认为,在1508年版托勒密《地理学》之前,欧洲人并没有整体的非洲地理知识,也没有绘制出完整的非洲地图,然而,这幅绘于郑和下西洋之前也就是在迪亚士、达迦马之前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它所描绘的“世界”,竟然东起朝鲜和日本列岛,东南包括了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有渤泥(婆罗乃),三佛(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北面已绘到大泽(今贝加尔湖),特别是,正西竟然绘出了下垂的阿拉伯半岛和倒锥形的非洲大陆,包括了欧亚非三大洲,因此,引起了历史学界相当大的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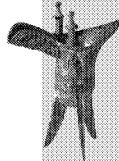
那么,是什么人有这样的地理知识?是谁一一标志出了东起日本、经朝鲜、中国和中亚到阿拉伯半岛乃至非洲的各个地名?它真的对欧洲人的大航海发生过影响吗?最近,一部全面研究这幅地图的书,日本京都大学宫纪子的著作《蒙古帝国所出之世界图》,对此进

行了全面的研究。

宫纪子这部书,虽然是一个介绍性的著作,但它给我们全面描绘了有关这幅地图的基本知识。根据这幅地图下方李朝朝鲜人权近跋文可以知道,这是朝鲜左政丞金士衡和朝鲜右政丞李茂,在看到中国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僧人清浚的《混一疆理图》之后,令官员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而成的“新图”,即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据日本学者以及宫纪子对图中所用地名的研究,《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是在蒙元时代绘制的。因为这个缘故,照着李泽民和清浚两幅地图再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也照样沿用了蒙元时代的一些地名旧称,而这幅地图反映的也是蒙元时代的知识。

人们关注的问题是,既然它是元代人的知识,那么在欧洲人之前,亚洲人怎么会先知道有关非洲的地形?为什么蒙元时代能够画出这样的亚非欧洲地图?在《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不仅画出了大体的非洲,阿拉伯半岛更是画得相对准确。因此,很多学者都倾向于相信,这些地理知识之所以传到中国,和来到汉





族地区的阿拉伯人有关。此外,由于宫纪子的介绍,我们都知道了有关这一类地图的更多知识。过去,人们都以为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唯一的,但是在1988年,日本旧岛原藩松平氏的菩提寺即长崎的本光寺,又发现了一幅面积更大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长220厘米,宽280厘米),而在熊本的本妙寺、天理的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也发现了同样左有非洲、阿拉伯半岛,右有朝鲜和日本的《大明国地图》。而中国学者也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类似的《大明混一图》,在这幅更大的地图上,同样也画了非洲和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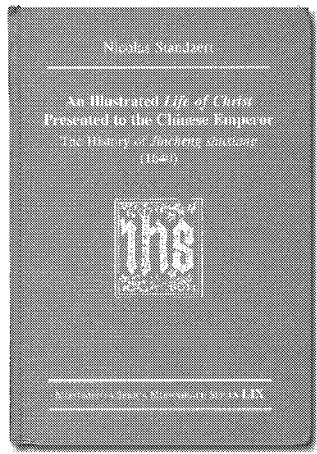
拉伯半岛。

为什么中国人首先绘制的包括非洲的世界地图没有在中国流传,而传到了朝鲜?为什么这幅朝鲜人画的地图会收藏在日本?是否其中有来自阿拉伯的世界地理知识?因此,这幅地图给我们提出的另一课题就是,如何理解超越王朝疆域的知识史传播?□

(宫纪子著:《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图》,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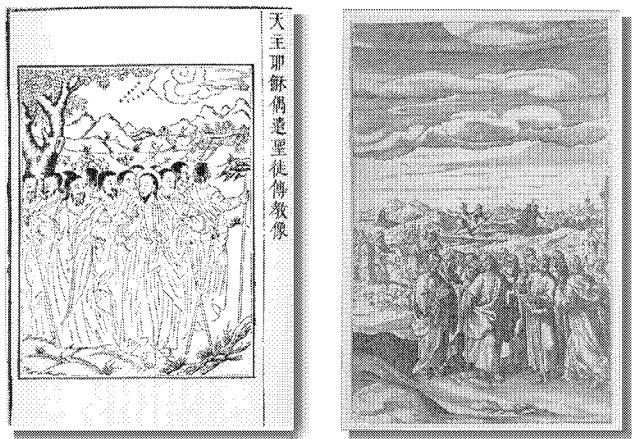
最新书讯

- 《进呈中国皇帝的插图本〈基督生平〉:进呈书像(1640)》(华裔学志丛书)



我院国际评鉴委员会委员钟鸣旦教授(Nicolas Standaert)新著《进呈中国皇帝的插图本〈基督生平〉:进呈书像(1640)》(华裔学志丛书)*An Illustrated Life of Christ Presented to the Chinese Emperor: The History of Jincheng Shuxiang* (1640) 新近出版。

作者将耶稣会士汤若望于1640年进呈明朝皇帝的《基督生平》与大量的欧洲当代出版物作对比,认为将绘画用于宗教用途属于特有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耶稣会士在中国传道的神学理念。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追溯《进呈书像》起源于欧洲又为中国所接受的历史,第二部分为此书在中国



左图:天主耶稣偶遣圣徒传教像(中国版本)
右图:Christ Sending Out the Disciples(欧洲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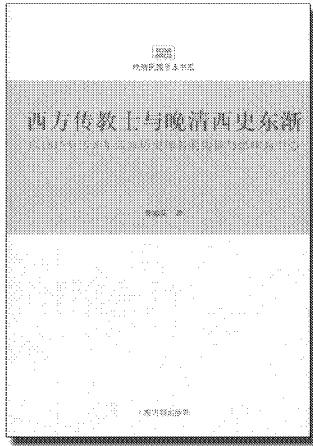
的复制品及文字解说。鉴别《进呈书像》欧洲原作的过程构成了这一研究的核心,它在研究明朝中国之外,也开创了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新路径。

-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

我院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新著《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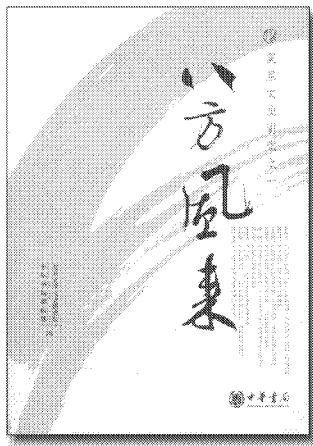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现已成为学界的关注点,而该书致力于对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西史东渐”进行历史的寻绎和价值的重估,也因之凸显其原创性。



作者认为晚清西方史学译著的传播对中国史学产生过多方面的巨大影响,使晚清史学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了使上述结论坚实有据,全书力图在资料上有新的开掘和突破,在方法上立足于实证研究,并借鉴了“阅读史”和“译介学”研究中的接受理论,在论述体裁上则采用符合论题意蕴的“专题史”样式。全书将对问题的解读建立在一定的量化的基础上,力求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同时也试图在传播与影响研究的层面上来回应和修正前人研究的不足。

• 《八方风来》(复旦文史讲堂之一)



我院“复旦文史讲堂”第一辑《八方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复旦文史讲堂”前八场知名学者演讲实录,由葛兆光教授作序,配有讲演现场演示图及听众提问交流部分,忠实重现了讲堂现场。

“复旦文史讲堂”历次讲演摘要可参见我院网站“讲堂印象”栏目。

•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复旦文史丛刊”第二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皮庆生著,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透过张王、祠赛社会、祈雨、祠神信仰传播、正祀与淫祀五个个案,将民众祠神信仰置于唐宋社会变革的背景下,考察祠神活动存在、演变的真实状况及其复杂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

作者认为,祠神信仰是宋代各社会群体共享的信仰世界。皇帝、士大夫、释道人士、商人、普通百姓都是祠神的信众,积极参与祠神信仰的各种活动,如修建庙宇、组织赛会、申请朝廷封赐、主持祈雨仪式等。其中,转任各地的官员、士人以及释道人士(而非商人),是传播祠神信仰的主要力量,一些士人还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方式,为祠神信仰传播寻找理论支持。

同时,祠神信仰也是现实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政治权力、经济发展、交通网络等要素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朝廷的祈雨观念、实践可能推动现实政治措施、政治态度的改变,乃至制度的建立,而赛会中的组织、仪式活动直接影响着地区、宗教、职业群体的认同,祠赛社会、祠神信仰传播也可以推动不同自然区域、行政区划、经济区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从信仰的合法性而言,朝廷的意见起着决定任用,但正祀与淫祀之间,尚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在面对祠赛社会、祈雨中的“异端”、正祀与淫祀等问题时,朝廷、地方官、理学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在观念与行为上存在着差异,这反映了唐宋社会变革中朝廷与地方、官方与地方社会、推广中原儒家文明与维持地方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外刊撷英

- 《俞樾作品中的回忆、哀悼与文章类型》(Memory, Mourning and Genre in the works of Yu Yue) by Rania Huntingt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67: Number 2, December 2007

文章考察了俞樾(1821—1907)的作品中展示的回忆、哀悼、家庭关系与作品类型之间的关系。为哀悼妻子姚文玉和女儿俞绣孙并构筑一个记忆之地,俞樾使用了多种文体,如诗歌、笔记、书信及序文,每种文体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两位女性自己的作品对帮助他努力回忆往事来说非常重要,出版她们作品正是表明他哀恸之情的关键所在。通过指出俞樾采用与他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的名称题写自己的著作来收藏回忆,如《小浮梅闲话》、《百哀篇》、《右仙台馆笔记》、《惠福楼幸草》、《茶香室丛钞》、《茶香室经说》、《春在堂诗抄》、《春在堂随笔》、《春在堂尺牍》、《曲园自述诗》等,作者利用“记忆之宫”的概念,即不同的地方代表俞樾不同的悲恸之情,探讨了作品与地名之间的观念性边界。

- 《留传后世的唐代抄本:以文学作品为例》(The Manuscript Legacy of the Tang: the Case of Literature) by Stephen Ow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67: Number 2, December 2007

通过聚焦《文苑英华》成书的十世纪晚期的宋朝

皇家图书馆,宇文所安考察了保存至宋代的唐末及五代抄本的情况。因后来印刷的唐代文学作品全部以这些抄本为底本,因此考察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有必要。宇文认为有些唐代文学作品只是偶然地幸存了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文本常常是某个作者部分作品集被重新整合后的东西。他列举了十一世纪的学者试图把同一作者的不同抄本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作品集的例子,并提出了一个假说,即,与其说千卷本《文苑英华》是通常意义上的“文选”,不如说是宋代皇家图书馆“集部”保存的每种著作的残篇的内容梗概。

- 《明代第一大儒入祀孔庙的历程》(Enshrining the First Ming Confucian) by Khee Heong Ko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67: Number 2, December 2007

作者分析了明代第一大儒薛瑄(1389—1464)长达一百年的入祀孔庙之路。起初,官方拒绝薛瑄入祀,理由是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与儒家学派的联系不大。为消除这些障碍,薛瑄的拥趸者精炼自己的辩词,建立专祠以改善薛瑄的名声,并极力推广他的教义。只有在最终建立起了评价儒学的新范式时,他们才成功地把薛瑄供奉进了孔庙,不过却是与有着和他相矛盾的哲学倾向的明代学者一起分享这种荣耀的。有了新范式武装,且有公众舆论支持,加上政治优势,薛瑄的支持



者最终保住了他在孔庙中的地位。作者的分析给明代的学术史研究带来了形而上学的角度之外的新启发。

- 《印刷的世界: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出版文化与社会》(The Printed World: Books, Publishing Cultur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Tobie Meyer-Fo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66: Number 3, August 2007

明代晚期以来,中国出现了图书生产及消费的热潮。印刷好的书页装订成册、保存在盒子里,从而能够随意搬动,并能经受住社会动荡。它们的流动造成了深刻的政治和知识冲击,因而其轨迹能够阐明更大层面的社会的、知识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方式;它们涵盖了国家—社会关系,文人的口味,大众的读写能力,知识界的发展趋向,流通网络,商业化,地方研究及性别等问题,所以还能揭示读者、著者、出版者和消费者所建构的身份。作者参照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术研究方法,对美国和日本的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史这个不断扩展的研究领域做了简略评价。文章并不局限于从技术史的角度来考察书籍史的问题,而是更加关注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尤其关注中华帝国晚期书籍的“出版地”问题。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分析了书籍的读者和生产者的地域倾向及社会地位。

- 《唐代的文学集成》(Literary Collections in Tang Dynasty China) By Christopher M. B. Nugent, *T'oung Pao*, Vol. 93, Issue 1-3, 2007

本文考察唐代的文学集成编撰情况,目的在于让读者明确,通过编撰集成这种重要的手段,诗歌在那个时代被大量收集、保存并得以传播。作者指出,若要全面理解唐代的文学文化,我们就必须更好地掌握现存文本文献,在这些文本之中,诗歌被不断创作、广泛传播,并被认为是一种基于原稿的文化。唐代诗歌序文的编撰向我们揭示:文本的流存不足为信;是什么构成了一篇特定诗文“最好的”或最正确的版本,这样的思想观念更具有可变性。

- 《北宋时期的流行病和医学:伤寒学的复兴》(Epi-

demics and Medicine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Revival of Cold Damage Disorders) By Asaf Goldschmidt, *T'oung Pao*, Vol. 93, Issue 1-3, 2007

文章的研究聚焦于公元三世纪时的医学流派——伤寒学——在北宋时期的复兴。为探寻推动这一复兴的原因,作者开始对北宋时期的各种流行病作一番历史的调查。数据显示,1045—1060 年间所记录的流行病情况存在波动。为应对这些流行病,北宋政府设立一个机构,负责修订并刊印医书。这个机构刊印了十篇医学论著,然而它们却不在皇帝下旨设立该机构时所指定的医学经典书目之内。在最卓越的编撰者中,有三人表现出他们各自具备的独特的医学知识——伤寒学。结果,在十篇医学论著之外,该机构又出版了三本关于伤寒学的专书,这三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伤寒学方法有关的。

- 《向 1402 年政变的殉难者致敬:明朝中后期的历史记忆》(Venerating the Martyrs of the 1402 Usurpation: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By Peter Dittmann, *T'oung Pao*, Vol. 93, Issue 1-3, 2007

明朝建文帝的皇位于 1402 年被其叔父篡夺,在这次政变中有不少官员因忠于建文帝而殉难,本文就是考察明代人纪念这些忠诚之士的演进过程。虽然获胜的永乐皇帝曾篡改历史记录,以此诋毁或抹煞这些官员,然而有明一代,学者们逐渐地寻找到重构 1402 年政变事件的方式,他们把这些殉难者作为地方杰出人物来纪念。作者探究当时修史计划的演变情况,并发现,对建文帝殉难者的评论方式是随着政治形势和文人群体的发展而形成的,这种趋势既表现在地方上,也反映在整个帝国的大背景之中。

- 《大厦将倾之时的梦和自我求索:〈薛衡孟笔记〉》(Dreaming and Self-search during the Ming Collapse: The Xue Xiemeng Biji, 1642-1646) By Lynn A. Struve, *T'oung Pao*, Vol. 93, Issue 1-3, 2007

明清鼎革之际,数量空前的文人纷纷涌入佛教各级神职,远远超过了成为道教教士的人。在士大夫薛

宋的笔记中,大量的论述证实了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他的笔记表明,众多文人在明亡之际所感到的觉醒和羞耻,使佛教救世学比道教救赎观似乎更能有效地缓解他们的精神危机。通过其中许多关于“梦”的记载,薛宋的笔记为解释这个问题提供了特殊的视角,这些记载也反映出薛宋本人在1642—1646年间精神世界的变化,并为明末精英文化中“梦”现象的突出提供主要例证。

- 《又一次汉魏交替——围绕北魏道武帝时期“魏”号制定问题的考察》(もうひとつの漢魏交替——北魏道武帝期における「魏」號制定問題をめぐつて)

By 佐藤 賢,東方學,第百十三輯,2007

从匈奴刘氏的“汉”政权到鲜卑拓跋氏的“魏”政权,“魏”这一国号表明拓跋氏试图在内蒙古地区夺取统治权的坚定意志。建国六年(391年),拓跋氏与慕容永缔结为同盟以后,“魏”逐渐升格为“天下之号”;天兴元年(398年),东晋使者来朝,鲜卑政权内部群议纷起,使“魏”正式成为“天下之号”。与此同时,拓跋氏努力确立“大魏”的正统性,于是朝廷中形成了“北夏”和“南夏”的历史观,按照北魏统治集团的理解,这段历史就是从“汉”世界向“魏”世界的转折,即“又一次汉魏交替”出现了。□

王红霞 姚建根 摘

从翻译家到汉学教授——傅兰雅身份转变探析

◎ 王红霞

1896 年前傅兰雅的身份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首席翻译，1896 年后则成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东方语言与文学教授。作为晚清的科技翻译家，他的译作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是否如他所愿？从翻译西书到教授中文，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这一身份转变的？成为美国大学里的汉学教授后，他又做了怎样的工作？这些工作对傅兰雅的中西文化交流事业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问题不仅对理解傅兰雅一生的西书中译事业来说非常关键，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很重要的意义。

以往的傅兰雅研究较多关注他在中国的科技传播事业，他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创设格致书院以及发行《格致汇编》这些活动的意义和影响都有学者考察过。但对于他赴美任教，身份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首席翻译转变成伯克利加州大学第一任阿加西教授这个问题，却鲜有论述。作者在博士论文《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傅兰雅留下的书信文章，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这些问题做了初步探讨。

文章分四个部分：译书志向难酬、申请东方教席、任职加州大学、心系中国进步。

作者通过解读傅兰雅与家人朋友的通信，并考察他的译书在当时的影响来分析傅兰雅决定转变职业身份的原因，认为傅兰雅 1896 年去美国有两个原因。首先，1893 年他想到要申请这个职位时，他的家人，即他

的美国妻子和他与前妻生的四个孩子已经在美国定居，他也已经五十多岁。其次，他在中国三十五年，从事制造局的译书活动也有二十八年了，他到中国后一直把中国的文明进步当成自己的事业去追求，但多年的经验和中国的现状令他失望，他觉得自己在制造局的事业再难有大的起色。美国大学里的教席正是他改变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好机会。在申请东方教席部分，作者交待了东方语言与文学教席的来源和设置目的，并考察了傅兰雅对这个教席的期望和该教席对他来说的意义。任职加州大学主要论述他担任阿加西教席期间所做的工作，尤其是他为这个教席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和他为中国学生到加州大学读书创造的条件和机会。心系中国进步其实是对傅兰雅到美国后所发表的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及关于中国教育状况的文章做的一些介绍和粗浅分析，作者认为这些文章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他到美国后依然关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并证明了虽然傅兰雅到美国后与在制造局期间所做工作的种类不同，但他致力于中国文明事业的志向从未改变。

讨论会上，葛兆光老师及博士后同仁们针对该文的选题和论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给作者提供了进一步修改文章的意见和建议。□

（王红霞为本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08.01—2008.03)

• 2008 年 1 月 4 日

我院公布了第二批研究项目招标公告,本次公布的项目涵盖“从周边看中国”、“批判的理解国际中国学”、“交错的文化史”、“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宗教、思想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五个领域,招标截止时间为 3 月 20 日。

• 2008 年 1 月 16 日

我院召开在沪学术委员会议,参加者有周振鹤教授、汪涌豪教授、章清教授、陈大康教授、葛兆光教授等。会议讨论了:(1)应聘人员面试计划,(2)第二批项目审查程序,(3)本年度工作计划。会议决议包括:(1)专职研究人员面试名单,(2)与越南汉喃研究院方面联系编纂《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3)由于人力资源的额关系,暂时不编《集刊》。

• 2008 年 1 月 22 日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晓漫召集校长助理桑玉成以及校财务处、人事处、文科科研处处长,讨论文史研究院人事制度问题,由葛兆光教授介绍文史研究院独特的 985 基地建制,并希望学校协助解决我院目前存在的问题,陈晓漫副校长提议下学期开学初由桑玉成教授召集各处,主持协调和解决。

当日,我院国际评鉴委员会委员、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系教授张隆溪获香港城市大学首届杰出研究奖大奖,此计划用于表彰及奖励香港城市大学教

研人员的杰出研究。

• 2008 年 1 月 24 日

《光明日报》发表我院葛兆光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演讲《揽镜自鉴:从域外汉文史料看中国》。

《社会科学报》以《“从多面镜子看中国”》为题报道 2007 年 12 月我院举办的“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 2008 年 2 月 17 日

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孟柱亿来访。

• 2008 年 2 月 27 日

我院新招收的博士后朱莉丽报到进站。朱莉丽原为山东大学历史系博士,在复旦大学合作导师为葛兆光教授。

• 2008 年 2 月 29 日

上海博物馆教育部分别主任郭青生及吕维敏来访。

• 2008 年 2 月

中华书局出版了与我院合编“复旦文史讲堂”之一《八方风来》,本书收录了 2007 年 3 月本院举办的前八场“文史讲堂”演讲,演讲者均为美国、比利时、日本及中国台湾与香港的著名学者。本书忠实地保留着主



持人的评点、演讲者的口语，最大可能地重现演讲现场的真实感，使读者也能感受到身历其境的讲堂氛围。

● 2008 年 3 月 1 日

我院助理研究员董少新应台湾中研院科学史委员会徐光台教授邀请，在该院做《行医与传教》的演讲。

● 2008 年 3 月 3 至 3 月 8 日

越南汉喃研究院院长郑克孟教授、《汉喃研究》副主编丁克顺副教授、研究人员黎氏秋蕃来访，并与我院葛兆光院长、汪涌豪常务副院长、学术委员周振鹤教授及双聘研究员陈正宏教授就合作编撰《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之事进行商讨。

经过四天的反复讨论，我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达成协议，由葛兆光院长与郑克孟院长代表各自单位，于 3 月 8 日签订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编纂协议书，且确定交由复旦出版社负责出版，并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签订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约稿合同》。

● 2008 年 3 月 4 日

我院双聘研究员吴震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做题为《宋明理学与宗教》的学术讲演。

● 2008 年 3 月 6 日

我院助理研究员董少新应台湾花莲东华大学历史系蒋竹山教授邀请，在该校做题为《真实的谎言——明末清初天主教治疗奇迹之阐释》的演讲。

● 2008 年 3 月 12 日

葛兆光教授参加王生洪校长主持的接待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Shirley Tilghman 一行的会议，并介绍了复旦文史研究院与普大东亚系方面的交往，提出两校人文学科若干可以进一步合作的领域。

● 2008 年 3 月 13 日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黄松来访，葛兆光教授、周振鹤教授

接待。

● 2008 年 3 月 17 日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施耐德教授来访，并向我院介绍莱顿大学东亚研究之计划。

下午，施耐德教授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傅斯年、陈寅恪与德国兰克学派之关系》的讲演，葛兆光教授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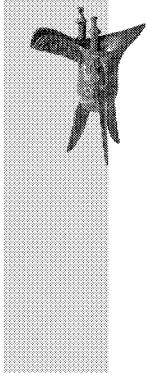
当日，我院助理研究员董少新应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祝平一研究员邀请，在该所做题为《视觉戴上文化的眼镜——早期西洋解剖图的传入、传播与演变》的演讲。

● 2008 年 3 月 18 日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孔子学院院长、讲座教授刘宏来访，我院葛兆光教授、双聘研究员韩昇教授接待。

● 2008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

波兰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艺术史系系主任 Piotr Piotrowski 教授一行 6 人来访我院。3 月 19 日下午在我院 2814 会议室召开“中波当代艺术与美学”学术研讨会，葛兆光教授与 Piotr Piotrowski 教授分别代表双方致辞，参加会议的中方代表有：我院常务副院长汪涌豪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李超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魏劭农教授、上海书画出版社卢辅圣社长、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王天德教授。波方参加者有 Piotr Bernatowicz、Monika Szmyt 等，会上发表了《团结与审查》、《中国当代艺术在波兰》、《中国当代架上绘画发展新动向》等论文，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对话。19 日晚，Piotr Piotrowski 教授为“复旦文史讲堂”作了题为《如何书写中欧艺术史》的演讲，由中文系朱立元教授主持。21 日，由汪涌豪教授陪同赴上海中国画院，参观了程十发藏品陈列馆一百二十多件宋代以来的中国书画，并与画院人员座谈。当日，还参观了上海当代艺术社区如莫干山路 50 号及泰康路田子坊等。



● 2008 年 3 月 18 至 19 日

我院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澳门基金会、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香港大学图书馆主办的“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交题为《马礼逊父子与〈外国史略〉》的论文。

● 2008 年 3 月 19 日

我院助理研究员董少新应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李贞德教授邀请，在该校做题为《清中前期宫廷西洋医学》的演讲。

● 2008 年 3 月 22 日

葛兆光教授应邀在宁波图书馆为“天一讲堂”作题为《最后的贵族——孔子的理想及其时代》的讲座。

● 2008 年 3 月 28 日

日本关西大学校长河田悌一教授，关西大学吾妻重二教授、沈国威教授、陶德民教授、西川和男教授一行访问我院，葛兆光院长接待并就我院研究情况做了介绍。

当日，我院组织对两位研究人员应聘者的面试，葛兆光教授、汪涌豪教授、王振忠教授、陈正宏教授、章清教授、陈淳教授、杨志刚教授出席。

● 2008 年 3 月 29 日

日本关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在复

旦大学新闻学院培训中心举行上海联络站挂牌仪式，我院葛兆光教授应邀出席并致辞。

● 2008 年 3 月 29 日—30 日

我院双聘研究员韩昇教授赴中山大学参加“地域社会与魏晋南北朝研究”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关于古代东亚世界的学术报告。

我院助理研究员董少新参加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组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举办的“第八届科学史研讨会”，并提交论文《天地人神之关系与中西医学文化的首次相遇》。

● 2008 年 3 月 31 日

我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举办第二次博士后论坛，由姚建根博士作题为《南宋的国防》的报告。

● 2008 年 3 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韩昇教授的专著《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化》。

《复旦学报》第二期葛兆光教授主持的“文史研究新视野”专栏刊登去年“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中的两篇论文，即葛兆光教授的《拦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与李焯然教授的《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

月底，我院双聘研究员陈正宏教授赴日本庆应大学做访问学者，历时一年。□